看不透的东方：西方视角下的“中国话题”

江 山

内容提要：2007年秋，“和谐”与“科学”这两个分别凝聚着东西方文明遗产的理念被同时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正式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标尺。过去的100年，中国人一直试图打破体、用之争，通过融合东西文明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而世界另一边的人们正在用惊讶、期盼，或焦虑甚至恐惧的复杂心情关注着中国发生的一切。过去的200年里，习惯了以胜利者之尊来诠释历史的西方世界同样习惯了以自己的视角来看待每一个当下的时代，在这一视角中，中国总是一个不能完全被看透的东方世界。中国的发展牵动着西方“中国话题”的走向，而西方在这一话题中的得与失、变与不变都意味着未来的西方世界需要学会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他人。

一、这个秋天，大事发生在中国

经过了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最初的8年，中国成长为经济大国。但是同时，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也随着经济的增长凸显出来。在中国共产党于新世纪初完成一波新老交替之后，“第四代”领导集体开始尝试为国家找到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区别于从前单纯专注于经济总量的成长，新领导力求探索一条更为平衡的社会发展路径，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思路建立“和谐社会”。而在对外交往领域，中国开始展现更为坚定的姿态，在与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博弈中表现得更加灵活，并回归到以我为主的路线。

2007年的秋天，中共十七大的召开再次启动了新老领导集体交接的前期准备，与此同时，以和谐社会为标尺的中国崛起开始全面提速。“和谐”与“科学”两个分别沉淀了东西方文明价值的理念被同时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人在重新找寻文化根基和探索前行方向的道路上坚定地迈出了新的一步。世界的另

一边，西方紧密地关注着当代中国发生的一切，从内政到外交，甚至是中国人的心理世界。他们感叹道：这个秋季，真正的大事发生在中国！

伴随中国发展模式的调整和在国际事务中地位的上升，西方舆论中的“中国话题”也逐渐脱离了与改革年代的中国初期接触时所经常流露出的情绪化与道德自负色彩。如果用“百花齐放”的多元观感来形容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有些言过其实的话，那么见仁见智的客观评说则的确越来越成为西方“中国话题”的主导方向。

中国的变与不变牵动着西方的“中国话题”，同时也影响着这一话题本身的进行方式与方向。

二、政策链条中的大舆论：媒体与学界

在详细检视西方舆论的“中国话题”之前，有必要首先对西方的舆论界本身进行一些探讨。

这里所关注的舆论并非狭义的媒体，而是囊括大众传媒与学术思想界的大舆论。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政策形成、执行及监督链条中，这一大舆论不仅扮演了政策倡议和参谋的角色，也发挥着上承政党、政府，下联百姓大众的思想传播作用。这其中的学术界并非以大学为代表的理论、思想象牙塔，而是指以智库等政策研究机构为核心、与大众传媒和公权力紧密互动的政策圈的一部分。西方尤其是美国大舆论的听众不仅是本国政府与公众，更掌握了全球的话语权。

由媒体和学界所组成的大舆论在政策链条中，特别是在对外政策领域中扮演着建议、形成、宣导及监督这些不同阶段和不同类型的重要角色。以美国为例，这一政策链条串联起了财富、思想、媒体和公权力，负责向公众塑造世界和他国的形象，而这一公民教育反过来又会成为政府或国会这些直接决策者贯彻政策时的依据或阻碍。

在美国，这一政策链条的第一阶段是资源与思想的关联。最初被用于支持国家政策研究、调查、规划和制定的资源（经费），大多来自于包括企业和个人的私人财富。[1]这笔资金被以捐助或合同的方式分配给各个基金会、大学和智库等研究部门。从人事安排上，这些捐赠的个人或企业的经理、董事或股东多会担任研究部门的理事会成员，监督和参与资金的使用规划。[2]

在美国的政策链条中，基金会是重要的一环。各种来自企业或个人的私人资金通过基金会进行最初的汇总。相比财源与学界的直接联系，通过基金会进行连通的间接关系更加普遍。因此，基金会便承担了播撒“种子钱”的任务。在各基金会将“种子钱”投向思想界之前，它们会首先在内部确定主要的政策目标与方

1 Thomas R. Dye, *Who's Running America? The Reagan Years*, NJ: Prentice Hall, 1983, Chapter 9.

2 Ibid., Chapters 2 & 3.

向，议题覆盖从大国关系、国家安全战略、全球经济体系到国内经济方针、城市发展战略、人口问题、公共卫生的广大范围。基金会在与受资助方及合作对象进行互动时具有软性的“权威”。[1]虽然不是上下级的关系，但是学界研究机构必须迎合基金会的政策导向。当然有些独立学者也会对政策制定起到影响，有时研究部门提出的研究建议也不尽合乎基金会事先确定的方向或重点，但是总体来说，学者们使自己的建议得到重视的最佳途径还是按照经费提供方的意思进行研究。“种子钱”与学界的基本任务完成以后，政策链条便走到了另一个阶段：制造舆论。

在美国社会，所谓主流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是绝不能被低估的，而对其媒体的自由、多元程度也不可高估。[2]在一个通过理念、财富和社会关系等要素建立起来的精英网络中，新闻媒体在对外关系领域所扮演的角色首先是各精英集团相互影响、制衡并传播自己观点的工具，其次才是相互竞争并代替公众扮演监督作用的社会公器。[3]以华盛顿为例，这座城市的媒体与学界保持着极为紧密的联系。依托精英网络，（对外）政策建议与宣导的大机器每天以极高的效率工作着。

在美国社会，所谓主流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是绝不能被低估的，而对其媒体的自由、多元程度也不可高估。

当社会舆论被充分调动起来以后，最后的行政与立法工作便可以顺利展开了。但是，行政首长和国会议员们每日所操心、争吵的往往并不是政策核心的方向性问题，而是具体的操作方式、次序或善后。

由此可见，由学界与媒体所组成的大舆论在幕后扮演着隐性的上游政策链条。这一大舆论在冷战期间扮演了美国对苏政策的外脑作用，而目前，这部大机器又将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了对中国的观察、研究和宣传。

由学界与媒体所组成的大舆论在幕后扮演着隐性的上游政策链条。

2006年秋季，美国最为重要的智库之一布鲁金斯学会设立了中国政策中心——该学会的第一个国别研究中心。而这仅仅是“中国热”最近十年呈几何级增温的一个表现。除了背景较为单纯的大学与智库，美国主要部委、军种都有中国研究的专项机构，甚至绝大多数大型公司也都有中国项目与相应的研究部门。通过与学界、智库建立联系与合作，这些政

1 关于基金会在西方、美国的地位和作用，请参考Thomas R. Dye, *Who's Running America? The Reagan Years*; Thomas R. Dye, *Who's Running America? The Bush Restoration* (7th Edition), NJ: Princeton Hall, 2001; 资中筠：“中介力量——大基金会的作用”，载《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第六章，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2 相关评价可参见 Noam Chomsky, *Media Control: The Spectacular Achievements of Propaganda* (2nd Edition),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02。

3 关于精英链条与媒体作用散见于Suzanne Keller, *Beyond the Ruling Class: Strategic Elites in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3; Thomas R. Dye, *Who's Running America? The Reagan Years*; Thomas R. Dye, *Who's Running America? The Bush Restoration* 相关章节。

府或商业组织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到了大舆论的营造中。

三、多维的协调：西方视角中的中国内政

在观察中国内部事务的过程中，西方媒体与学界的目光逐渐由早期对于个案和高层领袖的关注发展演变为在四个维度上的衡量：精英、信仰、机制与社会。

在2006年接受《金融时报》一次访谈时，曾任克林顿政府副国务卿的布鲁金斯学会主席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谈到，未来中国所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是如何在对外开放的同时管理其政治体制。[1]

在观察中国内部事务的过程中，西方媒体与学界的目光逐渐由早期对于个案和高层领袖的关注发展演变为在四个维度上的衡量：精英、信仰、机制与社会。无论是中国内部的稳定还是未来政治社会体制的发展方向都涉及这四个维度上的协调性、一致性问题。

精英协调

这其中，精英协调一般被看作为决定内政走向最为关键的因素。在西方观察家看来，人民共和国早期历史上的政治动荡几乎无一例外地与政治、经济、文化精英的权力斗争有关。而从最近十年的历史来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精英之间达成了比前几十年更为有效的协调与协作。[2] 如果从意识形态取向、政治经历、社会背景、精英互动机制（如新老世代交替）等方面衡量的话，政治领导体系中的政治精英取得了越来越强的协调性。[3]而在政治精英与经济、思想精英的互动方面，从改革开放的第二个十年开始，经济、思想精英越来越多地被纳入政治精英的行列，三种精英互动的内化 (internalization) 将有助于减少人民共和国早期那种因精英内耗而造成的国家和社会动荡。

展望未来，关于十七大之后的精英协调，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李成的观点作为一家之言在美国比较有影响力。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内部正在形成精英派 (elitist coalition) 与大众派 (populist coalition) 的整合。[4]这一整合在十七大之后党代会、

1 Edward Luce, "US think-tank to launch China policy centre,"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9, 2006.

2 Cheng Li, "The New Bipartisanship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rbis* (Summer 2005), pp. 387-400.

3 Minxin Pei, "China's Precarious Balance: Political and Social Cohesiveness and Stability in a Fast-Changing Society," at Asian Perspectives on The Challenges of China, Sponsored by th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March 7-8, 2000.

4 Cheng Li, *China's Changing Political Landscap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 2007; Cheng Li, "Leadership Change an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t the 17th Party Congress," at China's 17th Party Congress: Looking Ahead to Hu Jintao's 2nd Term,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Oct. 30, 2007.

党委及中央委员会三个层次的人事构成上得到了体现。同时，第五代接班人的安排模式也体现了这两个党内派系的平衡与合作。党内精英集团主要由原高层官员子女、企业家、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及城市和沿海省市领导组成；而大众派则主要由共青团系统、党务官员、新“左”派知识分子，以及乡镇与内地省市领导组成。李成认为这种“一党两派”的政治结构产生于并体现了不同的社会政治条件及地理区隔，衍生出不同的政策导向。除却彼此差异，更为重要的是，两个群体之间存在领导能力和专业特长方面的互补与相互支撑。许多西方观察家认同这样的观点，并相信这种党内的平衡与制衡有利于政治精英协调的机制化与提高政治互动的可预期性。[1]在一个告别强人政治的时代，两派系的共生关系将有利于党内民主的开展，并最终引导可能的国家政治体制改革。

意识形态

中国意识形态协调性在过去20年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所谓意识形态的协调，一方面是指官方宣导的价值与实际政策的一致程度；另一方面是指政治精英与公众共同认同该价值的程度。对于绝大多数西方观察家而言，以上面两个指标来衡量的中国意识形态协调性在过去20年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在改革的年代，中国传统思维习惯——潜意识中的实用主义（权变思维、务实变通）——取代了激进的意识形态成为主导政策的核心动力和指标。西方观察家认为，这一方面有利于中国政治的稳定和改革的推进；而另一方面正式官方论述中无法完全舍弃的意识形态价值宣导与实际政策之间的不协调又往往成为社会上犬儒主义风气的根源之一。此外，信仰的空洞化和纯粹建立在（物质）价值基础上的社会动员力可能导致政体与社会之间直接或间接的冲突，例如腐败问题，以及某种程度上对于民族主义的过分依赖甚至是向民粹主义发展的危险。物质条件的改善必然会引发精神世界的追求，对于这一点西方的观察倒是印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话：“仓廪实而知礼节”。

在填补意识形态和精神价值的空白方面，另外一些西方观察家也注意到了中国在诉求经济高增长和宣扬民族主义以外的另一个新的趋势，那便是传统思想文化的回归。寻找中国人的文化定位和精神内核是改革年代一项尚未完成的课题和必须接受的挑战。

机制建设

关于社会各种力量之间互动的机制化问题，西方舆论界也存在着类似国内盛

1 Victor Shih, “Elite Decision-Making in China's Financial Sector: A Quasi-Market Analysis,” Presentation at the Centre D'Etudes Prospectives et D'Informations Internationales (CEPII)“System Financier Chinois”Conference, Paris, France Sept. 19, 2005; Joseph Fewsmith, *Elite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rmonk: M. E. Sharpe, 2001.

行的某种“唯体制论”，在探讨如何解决中国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时便常会出现“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西方版本，例如“民主化一抓就灵”和“私有化一抓就灵”。不过作为全面审视中国发展的其中一个维度，机制建设的确是不可或缺的。

机制层面的协调和一致性是指在多大程度上主要的政治和社会机构能够按照国家总体政治体系的规则和理念运行。对于中国而言，在这一层面西方的主要关注对象是执政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西方观察家认为，在历史形成的党政 (party-state) 体制下，改革年代的中国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需要通过加强政府与社会 (state-society) 的机制化互动来解决。[1]中国政府与社会互动渠道的建设，例如法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民众初步获得了保护个人权益和权利的管道。但是整体而言，代表社会利益的合法机构及相应程序仍然很少。例如媒体、人代会以及法院这三个理论上享有自主权的平台尚未展现出足够的效能。

中国的政府—社会关系往往通过危机处理的模式展开。

因此，西方观察家认为中国的政府—社会关系往往通过危机处理的模式展开：即政治精英往往在政府—社会矛盾长期累积并激化为危机之后才着手介入。在缺乏相应机制以提前解压或疏导的情况下，党政系统面临危机往往（不得不）通过压制，而非协调的方式进行处理，这一问题集中体现在互联网管理和“群体性事件”的处理上。

社会协调

相比前三个因素，社会协调涉及更多的具体社会问题。而西方观察家倾向于从两个变量着手观察中国当前的社会协调：阶层分野和文化认同。第一个变量主要是关于社会的平等、公平和正义问题，而第二个变量则更多地涉及经济政治转型时期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和群体认同。

普遍而言，在改革过程中，中国的阶层分野扩大了。这是经济高速发展、“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必然结果。不平等在当代中国最主要的两个表现是地区差异与城乡差异。而另外，更有可能影响中国政治版图的新现象是随着国有企业改革而出现的广大城市低收入阶层。不同于广泛散布于各地的农村贫困人口，城市贫困人口分布更加集中、更易进行组织。此外，相比农村贫困人口，作为从前体制的受益者（国家雇用），城市低收入阶层对于相对的贫困化更为敏感；在诉求个人权益方面更加自信；在与政府博弈时也更有经验和技巧。

在社会协调的另一层面上，西方对于中国文化认同的观察则是两种截然不同结论。一方面，飞速发展的经济、政府激发的民族自豪感、民众自发的国家自

1 参考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Timothy Brook and B. Michael Frolic,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rmonk: M. E. Sharpe, 1997。

信、不断提升的国际地位以及对往昔历史荣光的憧憬，都大大提升了中国人的文化和国家认同。但是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全球化时代资讯交通手段的进步、与外界交流的增多以及苏联解体的余波影响，也使得个别边远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倾向有所上升。与国人的观感不同，大多数西方观察家认为，少数民族的认同问题在当下的中国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中国模式

西方人以惊讶、好奇、期待或担忧的目光审视着中国内政各个维度上的发展。无论是否带有意识形态道德自负的批判，整个西方都被在中国发生的一切吸引着。

2007年的上半年是中国在国际舆论上饱受争议的6个月，几乎所有的西方媒体都将指责的炮口对准了中国的贸易政策、货币政策、出口产品质量以及中国对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人权状况的责任。但是，当2007年秋季北京的领导人开始自信地为政权过渡和未来中国的发展布局时，西方的媒体与学界不得不再次思考一个过去十年不时被人提起的问题：在这个西方布局并主导的世界中是否已经存在一种叫做“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的发展理念？

从越南到叙利亚，从缅甸到委内瑞拉，乃至横跨非洲，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大都怀着崇敬与憧憬的心情关注甚至效仿着中国的发展。这种所谓的“中国模式”基本上由两种因素构成。一方面，是复制中国式成功的自由经济政策，向国内外资本开放市场，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保持低税率，并通过国有、私有部门的共同投资加强基础建设；另一方面，允许执政者（其中很多是由革命时代的革命政党转变而来的执政党）统一协调、管理司法、军队、国安事务以及信息的流通。

中国模式从未被西方舆论视为理想的发展模式，但毋庸置疑，对中国走过的发展阶段而言它是有效的。2007年秋，中国人为自己的未来规划、谋局。而《华盛顿邮报》也首次使用了“中国梦”的提法，只是这里的中国梦并非中国人自己的梦想，而是来自世界各地移民对新生活的企盼。美国记者惊讶地写道：在中国那些经济蓬勃发展的城市里，“外来族裔的聚居区再次出现，自1949年以来，这种现象还从未出现过”。[1]目前，超过45万外国人在中国持有一年至五年期的可延期居留证，相比2003年时的23万人几乎增加了一倍，700名外国人根据2004年生效的永久居留制度持有中国“绿卡”。“越来越多的世界各地移民正向东方进发，而不是西方，以寻求安全、宽容和机会。”[2]

无论“中国梦”的全貌是否理想，它绝不仅仅只有内政一面。如果说西方舆论在看待中国内部事务新的发展时带有更多的茫然和困惑，他们审视新时代中国

1 Ariana Eunjung Cha, "Chasing the Chinese Dream," *Washington Post*, Oct. 21, 2007, p. A16.

2 Ibid.

的对外事务时则更多的是惊叹甚至期许。

四、全方位的崛起：西方视角下中国的世界舞台

“布什总统在难以置信的地方找到了外交杠杆。这个地方就是中国。”[1]《纽约时报》在2007年10月的一则报道中这样总结中国近两年在外交领域的地位与中共十七大前后中美关系的定位。

西方将中国的进步称为崛起，而国人则自视为复兴（“再”起）。但无论如何定位，西方人眼中世界舞台上的“中国崛起”都是全方位的。2008年1月，当全球都在为可能到来的新一波经济衰退而担忧时，西方媒体开始出现大量的报道、评论，认为未来重整世界经济的重任将会由中国来担纲，虽然中国（以及其他可能的新兴经济大国如印度）无法独自完成这一过程，虽然中国本身也在承受着全球化带来的阵痛。[2]过去的2007年，西方的舆论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关于中国全球角色的报道和讨论，其中既有中国在朝鲜、伊朗、多边区域合作、全球反恐等国际热点问题中上升的协调人地位，也有“中国制造”的质量问题等负面报道，这凸显出尝试互相接纳的中国与世界（或西方）之间的磨合是何等关键。不过对于一个从被动接受全球化到主动拥抱全球化的中国，除了这些物质层面的硬指标，西方近几年尤其惊叹的是中国在“软实力”方面的提升。

越来越多的西方观察家开始关注中国在全球外交中对软实力的重视与运用。

特别是在布什政府推行单边主义外交和美国陷于伊拉克泥沼之后，越来越多的西方观察家开始关注中国在全球外交中对软实力的重视与运用。2007年6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为 Joshua Kurlantzick 的新书《魅力攻势：中国的软实力是如何改变世界的》举办了一场研讨会，这场研讨会吸引了华盛顿几乎所有相关政府机关、重要智库、各大媒体，甚至是包括中国大使馆在内的十余国使领馆人士。Kurlantzick 尚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学者和普通的政论专栏作家，但是很显然，他选择了一个好课题。与会的学者和媒体人都好奇地关注着这一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北京正在用一种“微妙”的方法（重新）拉拢亚洲、拉美和非洲，这些中国曾经在第三世界的老朋友。中国越来越善于利用外交、贸易激励政策、文化和教育交流等技巧，来塑造一个仁慈的领导者的形象，并同时打消人们对于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担忧。

1 Steven Lee Myers, “Look Who's Mr. Fixit for a Fraught Age,” *The New York Times*, Oct. 7, 2007.

2 相关报道如 Cahal Milmo, “2008: The year a new superpower is born,” *Independence*, Jan. 1, 2008; Martin Wolf, “The future: China changes the whole world,”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23, 2008; Nipa Piboontanasawat and Li Yanping, “China GDP Expands 11.2%, Supporting Global Growth,” *Bloomberg.com*, Jan. 24, 2008, http://www.bloomberg.com/apps/news?pid=20601087&sid=afREoswwa8.4&refer=home。

关于中国软实力的作用和效果达到了何等程度，西方媒体和学界中向来没有一致的意见，例如在发展中国家中是否存在某种用以替代“华盛顿共识”的“北京共识”这个问题上便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1] 但是大多数西方观察家赞同一个现象：中国软实力上升的同时，美国的软实力却在下降。美国形象的衰落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在那场风暴中，美国官员被认为对于亚洲所遭受的痛苦充满了冷漠。在上一个十年中，美国资讯服务和文化中心的数量大幅缩减，而同时却迎来了伊拉克战争。在一场没有明确界限和时限、并不受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关切的全球反恐战争中，美国失去了冷战时所享有的政治形象和外交优势。[2]

推广传统文化是经贸政策以外北京采取的最为重要的软实力措施。在中国塑造国际形象的过程中，西方舆论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当中国人在国内的基础教育中尚未系统地恢复儒家学说等中国传统先哲的思想时（即使仅作为语文教学也很有限），全世界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由北京资助兴建的孔子学院。如今的孔子学院分布于50多个国家和地区，它们推动了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传播，培训语言教师，并投射中国式的政治哲学：一种基于人与人和谐关系来思考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秩序的范式。

不过，与前文提到的信仰价值问题相关，西方仍然普遍对于世俗和权变的中国文化抱有很强的戒心。很多人认为“走出去”的中国将给世界带来极大的挑战，因为“中国人没有信仰”、“太过功利”，而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则“信得太多”。一个以商人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的中国，一个抛弃了革命理想又怀抱民族复兴梦想的中国是否会将世界引入一场新的、仅有实力政治的角斗？美国人或许并不天真地相信美国的外交中有多少真诚为世界造福的善意，但他们中的很多人似乎都倾向于认为，在一个“无政府状态”、没有哲学王的世界里，一个伪善的牧师恐怕比一个精明的商人更适合做领袖。

因而，在看好中国软实力外交的背后，西方的潜意识里认为，中国并不能提供普通民众如何建立自由和基于权利的政治与经济体制的系统的、有吸引力的目标，而这一目标对世界许多地方的人们仍然有巨大的吸引力。也就是说，类似中美在全球外交领域软实力的此消彼长的现象仅仅是美国政府外交政策失败的结果，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依然保有在价值观方面的优势。

---

1 关于“北京共识”的探讨可参见 Drew Thompson, “China's Soft Power in Africa: From the 'Beijing Consensus' to Health Diplomacy,” *China Brief*, Oct. 13, 2005; 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The Foreign Policy Center Working Paper, http://fpc.org.uk/publications/123。

2 这方面的相关讨论，可参见 Joshua Kurlantzick, *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Joseph Nye, “The Decline of America's Soft Power,”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4; Josef Joffe, “The Perils of Soft Power,” *New York Times*, May 14, 2006。

五、脆弱的超级大国

与十年、二十年前一样，无论对于中国内政还是外交，西方仍然以极其审慎的目光观望着中国的发展。但不同的是，从前西方对中国政策的定位往往徘徊于“接触”与“遏制”之间，而今则变为“依赖”与“遏制”。中国人省下的钱资助了美国的消费，中国货物抑制了美国的通货膨胀，中国对原材料的需求支撑了世界商品的价格……

与其说存在着某种制约中国的阴谋，不如说西方人自己在学习如何接受一个急速改变的世界时充满着困惑、犹豫与矛盾。

摇摆于“依赖论”与“遏制论”之间的西方舆论对中国的评价经常被国人视为“捧杀”和“棒杀”这两种殊途同归的终极目的。但是，在这种西方矛盾性态度的背后，与其说存在着某种制约中国的阴谋，不如说西方人自己在学习如何接受一个急速改变的世界时充满着困惑、犹豫与矛盾。

当加州大学的中国政治学者谢淑丽（Susan Shirk）对美国人讲中国是“脆弱的超级大国”时，美国人的反应是：“脆弱？中国并不脆弱！”但在中国，人们的反应则是：“超级大国？中国不是超级大国！”[1]套用谢淑丽的新书的标题，2007年底出版的一期美国《新闻周刊》用“一个猛烈却脆弱的超级大国的崛起”来形容中国。[2]文章说，2008年将是中国之年，而同时对于正值总统大选年的美国而言也应该是认真制定长期对华政策的一年。大西洋的另一边，就在英国首相布朗访华前夕，《每日电讯报》2008年1月20日刊文道：“别害怕中国的成功，中国失败才可怕。”[3]

以西方标准和价值观来看，中国也许是脆弱的。尤其是在内部，中国依然面临着如何看待近现代历史伤口，如何应对未来急速膨胀的老龄化问题，以及政府如何回应公众对于更高的生活水平以外的追求等问题。一派观察家便认为，中国急需一个更开放、更可靠、更愿意听取民众意愿的政府形式，以便对更强大和复杂的社会进行控制，否则内部的脆弱将有可能导致外部的冲突。

但是另一派学者和观察家则认为，那种认定中国的崛起必然引发大国冲突的看法是不全面甚至有害的。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所处的当今世界秩序是整合的、以治理为基础的、并有宽广且深厚的基础。对于中国而言，在这个体系中运作对其自身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由于核武器的存在，20世纪前半叶及18、19世纪那种大国间的战争将是自杀性的。很多迹象表明，中国认识到今天的

1 Susan L.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How China's Internal Politics Could Derail Its Peaceful Ris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Susan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at The SAIS China Forum, Washington DC, Oct. 3, 2007.

2 Fareed Zakaria, "The Rise of a Fierce Yet Fragile Superpower," *Newsweek*, Dec. 31, 2007-Jan.7, 2008 Issue.

3 Bruce Andersen, "Don't Fear China's Succes—fear its failure," *Telegraph*, Jan. 20, 2008.

西方体系是难以推翻的，加入它要容易且有利得多。[1]

面对一个潜在的“脆弱的超级大国”，西方人怀着非常矛盾的心情看待中国的成长和中国人逐渐增强的自信。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试图走入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来更多地了解中国。

六、以中国人的视角理解中国

以中国人的眼光审视中国，对于西方大舆论而言恐怕是一个有些苛刻的要求。不过的确有一批西方学者或观察家秉承这一观点，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美国学者蓝普顿 (David Lampton) 和老牌“中国通”李敦白 (Sidney Rittenberg)。如果用“融合派”与“权力派”来划分西方精英对华态度的话，这二人所代表的都可以算作“融合派”。[2]

在中国生活了35年，被毛泽东称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也曾被打成“美国特务”入狱16年的李敦白，在2007年春季布鲁金斯学会的一次研讨会上，对着台下众多中国问题专家“晚辈”们说：“别以我们美国人自己的思维来看待中国，教中国怎么做。”[3] 蓝普顿认为，是否能够设身处地、用中国人的眼光思考中国问题和中西交往，取决于如何看待中西特别是中美关系的本质：“零和”或是“双赢”。

无论是对于中国未来内部政治、经济蓝图的规划，还是对外身份、政策的定位，越来越多的西方观察家开始尝试理解和重视中国精英、大众所珍视的一些核心价值，例如稳定与自尊。但是整体而言，“融合派”声音在西方舆论中的扩大并不表示中国人的视角已被更多的西方精英所把握。这不仅是舆论立场的问题，也是一个教育和学习的问题。在中国的西学教育中，西方哲学、历史经典向来是伸手可及的必备基础读物，从中可以建构出一个至少是虚拟的与西方人近似的认知和价值体系。但是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当谈起中国的深层次思想积淀，得到的答案大多仅仅是几个空白、没有生命力的人名或符号。西方（或至少美国）的社会科学和政策舆论界在理解中国方面与其一向优秀的史学界之间存在着差距，而以前者的认知储备为基础所建构的

“融合派”声音在西方舆论中的扩大并不表示中国人的视角已被更多的西方精英所把握。

1 主张这一观点的最近代表作为G. 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Jan./Feb. 2008。

2 杨晴川：“美专家蓝普顿：要用‘中国眼光’研究中国”，新华网，2006年9月22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09/22/content_5122468.htm。

3 Sidney Rittenberg's comments at “Changes in China's Political Landscape: The 17th Party Congress and Beyond,” The John Thornton China Center, Brookings Institute, April 12 &13, transcripts available at http://www.brookings.edu/events/2007/0412china.aspx, http://www.brookings.edu/events/2007/0413china.aspx.

西方大舆论并不愿承认基于文化特殊性和认知差异性的各国政策差异。这种回避和否定的态度对于理解不同国家的思想历史遗产可能带来很大的困境。因此，又回到了交流的问题。正如“软实力”一节所讨论的，对于中国而言，这里所凸显的依然是廉价商品以外那些应该重点向外推介的文化精神。这也许才是影响甚至某种程度上塑造西方大舆论“中国话题”的本源之道，也是为什么西方会对中国“软实力”的上升具有本能的敏感。

七、看不透的东方

当代的中国又缺乏辜鸿铭和林语堂这样沟通东西的自我诠释者。

无论在内政还是外交方面，“和谐”与“科学”都成为今天和可预期的未来中国所推崇的两大核心精神（即使具体提法可能会改变），然而对于大多西方大舆论的参与者和受众而言，至少这两大概念中的一个是模糊不清的——和谐。当代的西方舆论仍然缺乏走入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途径和动力。中国从一百年的西方文化阴影中走出来，开始回归自我定位、寻找国家发展的文化核心根基。对于西方而言，当然需要时间去适应。但是，当代的中国又缺乏辜鸿铭和林语堂这样沟通东西的自我诠释者。这种情形使得当下西方的“中国话题”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关于一个看不透的东方。

西方略显无奈地惊叹于中国内政为何可以维持“脆弱的平衡”，更怀着些许担忧慨叹中国在世界舞台的步步上升。对于他们来说，潜意识里实在难以理解一个强国甚至是潜在霸权的成长如何能够不导致大国间的冲突甚或体系性的动荡。在西方的视角中，如果“和谐社会”还是一个合理的政策诉求的话，“和谐世界”便纯粹只是不切实际的宣传噱头。殊不知，本能地找寻文化根基的中国人可能已在一念之间将近现代的阶级史观和反帝史观回归为根深蒂固的天下观。而在这个新的天下世界，当美国人自信中国已经愿意成为自己的“利益攸关方”时，中国人的潜意识里也许只是将和谐世界的愿景本能地视为现代版的华夷共存。这个华夷秩序当然褪去了所谓优劣、教化的差别，但延续的是对于彼此差异的平和接纳。更为重要的是，融合“和谐”与“科学”的尝试意味着彻底否定了世界革命或民主输出背后那种普世主义和强迫世界为我所变的宗教式激情。这些，也许便是西方尚未完全看透的那部分东方。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